

● 唐力行
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九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唐力行

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九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9期/唐力行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590-1

I. ①江… II. ①唐… III. ①社会发展—华东地区—文集
②华东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19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 九 期

唐力行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2590-1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48.00 元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编委会

主 编 唐力行

副主编 钱 杭 徐茂明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王卫平	王国平	王国斌	王家范	王振忠
王璩玲	井上徹	卞 利	包伟民	李伯重	李孝悌
朴元煊	朱小田	朱荫贵	白井佐知子	刘 昶	
刘石吉	池子华	许纪霖	严耀中	苏智良	巫仁恕
吴建华	陈 江	陈忠平	邹逸麟	邱澎生	邵 雍
张海英	范金民	周育民	钱 杭	徐茂明	唐力行
陶水木	章 清	曹树基	萧功秦	常建华	滨岛敦俊
熊月之	熊秉真	樊树志	戴鞍钢		

编辑部主任 洪煜 编辑 王健 申浩

主办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S30404)

稿约启事

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2009年创刊，自2015年起每年暂定出刊两期。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述、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本刊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惠赐佳作。

二、本刊以发表高水平的中文研究成果为宗旨。欢迎有关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社会史的新视野、历史评论等方面的优秀稿件。

三、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字数不限。本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对所有投稿一般在收到稿件两个月内作出处理。一经刊发，奉寄稿酬。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36字）打印稿，并邮发电子版至本刊编辑部。

四、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

五、文稿请务必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著录文章题名、姓名、工作单位、关键词、摘要、作者简介、注释、参考文献等项目。

地址：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邮编：200234

收件人：徐茂明 洪煜

电子信箱：xumaoming@263.net hongyul028@263.net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编委会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九期)

区域社会理论研究

- 1 张国义
唐力行教授的江南区域史研究

江南经济

- 37 冯贤亮
清代江南内河地区的渔业与生活
- 65 〔日〕夏井春喜
日中战争时期江南的租赋并征

江南文化

- 89 吴建华
明代苏州地区姓氏宗族的来源
- 107 夏维中
试论明代中期江南都图地籍系统的形成及其影响
- 129 邹振环
墨海书馆与中国“新出版”的发轫
- 165 解 军
近代上海都市中的苏州评话研究

江南社会

184 [日]滨岛敦俊

“邑民安,令侯危”

——万历时期常熟知县耿橘的政绩

196 张海英

明清政府对双林镇的管理

212 巫仁恕

抗战时期沦陷下苏州的茶馆

学术评述

240 董圣兰

常州张门才女与晚清社会

——读曼素恩著《张门才女》

251 唐力行

略论周良评弹理论研究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260 徐茂明

周良评弹研究的原则与贡献

267 洪煜

文化人与文化的传承

——读《伴评弹而行》有感

学术前沿

273 唐力行

发现乡土中的历史记忆

——徽商与江南(上海)

284 李伯重

量化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从量化比较的视野看近代早期的江南经济

313 2015 年江南研究论著索引(上)

区域社会理论研究

唐力行教授的江南区域史研究

张国义

内容提要:唐力行先生的研究领域从徽商到苏州社会,再转至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但其研究的底色仍在徽学。而唐先生每涉及一个新领域,总是从搜罗相关的第一手材料入手,善于引入新的理论方法,观点不断创新,自成一家之言;并在研究的过程中提携后进,构建学术团队,主办年度国际学术会议,创办《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凝聚了一批江南区域史研究名家、青年后进。唐先生的学术人生是一体的,他生于苏州,长于上海,成于安徽,知命之年调至苏州,再迁上海,学术线路亦随着人生轨迹变迁,从徽学到徽州与苏州区域互动,再至评弹与江南社会,视界放宽到江南整体,而契机却在幼时耳濡目染的评弹,可谓是回归中的升华。

关键词:唐力行 徽学 江南区域史

唐力行先生以研究徽学知名,从徽州宗族研究切入,研究徽商、宗族、徽州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的特点,构建了以徽州乡村社会运作的“内循环系统”与徽州域外以徽州同乡会为代表的“外循环系统”相互作用的区域互动研究范式。唐先生还关注区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等相关问题。后来唐先生研究苏州

与徽州的区域互动、评弹与江南社会等都是其在徽学研究基础上的延伸和深化。唐力行先生的研究特点是注重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关注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创新,在区域史研究和区域互动的理论总结方面颇有建树,研究领域与时俱进,应和学术潮流,且能一脉相承。他还注重学术团队的建设,以师承、课题、杂志、丛书等为依托,在江南区域史研究方面引领一批出色学者,产生了强大的规模效应。

一、从徽商到苏州社会,再至评弹与江南社会 研究,以徽学为底色的区域史研究

唐力行先生的徽学研究有三个关键词:徽商、宗族、徽州文化。他提出以系统论观照徽学研究,认为研究一个区域,应首先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从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其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是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三要素的互动形成了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特征。在近年的徽学研究中,唐力行先生对徽州区域社会的认识得以深化。他指出自16世纪至20世纪中叶,由徽商、士绅、宗族三要素构成的“小徽州”(徽州区域)的内循环和“大徽州”(超越徽州区域疆界)的外循环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当内外循环均处于良性状态时,徽州乡村社会就会稳定、自治、繁荣,当内外循环中的一个循环系统被破坏时,徽州乡村社会就会陷入危机之中,但依赖另一循环系统,尚有自我修复可能,一旦两者都遭到破坏,则徽州乡村社会的传统自治格局就难以继了。^①

唐力行先生是由徽商研究进入徽学领域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任职

^① 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页。

于安徽师范大学,得地利之便,在安徽师大张海鹏教授的支持下,与王廷元、王世华等同事自1982年起从事徽商资料的选编工作,当年11月在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与张海鹏合作的《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该文于1984年发表,虽是唐力行先生的第一篇徽商研究论文,但却在学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余英时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就有十多处征引该文及唐力行先生参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年)。“徽商”成了唐力行先生徽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

此后唐力行先生又有《明清徽商心理研究》、《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1990年)、《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明清徽商木商考》(1991年)、《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1992年)等文发表。1993年唐力行先生出版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便是在徽商研究基础上的延伸,是著将明清商人纳入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视野下考察,认为商人是实现近代社会转型的革命性因素。唐力行先生指出:“近世社会,最先出洋闯世界的是商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是商人,最先仿洋改制看世界的还是商人。”^①该书着力在理论层面探讨商人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按唐力行先生的观点,中国近世社会始于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结束于20世纪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成熟。其间以1840年为界有两次关键转化,即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再由商品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书中指出,完成此转化的最大障碍是基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经济和政治结构。数量极大而单位极小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单位与庞大的专制政权的两极统一,形成了异常稳固的同构体。从而造就了中国商人的两难之境,既依托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又伴随历史的步伐改变着中国社会,却难以突破封建的樊篱。此后唐力行先生的学术关注基本上也在16—20世纪的中国近世社会。《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初版于20世纪90年代商人崛起,中国市场经济方兴未艾之际。如前哲所言,历

^① 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史是现实与过去之间不断的对话,无论从学术分量还是现实意义,作为第一部全面论述商人与近世中国社会转型的专著,该书都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后来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本(199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繁体字本(1997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2003年)、新版本(2006年)。

唐力行先生在研究徽商的过程中认识到“宗族组织是解开徽州社会之谜的一把钥匙”。^①其徽州区域史研究即以“宗族”为抓手。《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1986年)研究了徽商与宗族的互动关系,指出明清徽商善于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地区性或商业性垄断。《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1991年)指出,徽州在明代后期形成了小家庭大宗族格局,徽商对家庭—宗族结构的这一变化起了关键作用,而小家庭大宗族的社会结构对徽州社会经济特点的形成有关键性影响,它有利于徽商的经营活动,造成徽州社会更富有弹性和流动性。《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5年)指出,16世纪农村宗族制度的转型,首先表现在宗族迁徙和重建方向从由农村到农村转变为由农村到城镇为主,宗族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为地域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唐力行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徽人胡铁花、胡适父子,有《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1985年)、《胡铁花年谱述略》(1987年)、《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1993年)、《胡适的商业观》、《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1996年)等文,因而对于徽州文化有深刻体认,并将理学科举、宗族文化纳入到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1997年)一文认为,在明清徽州地域社会中形成了宗族组织,文化科举和商业经营之间的良性互动。《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探讨了徽州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变迁,宗族文化、商人文化对徽商及徽州农村社会的影响,宗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宗法制度在徽商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以宗族

^① 唐力行:《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的双重作用等。

唐力行先生的《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是其徽州宗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分八章,论述了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因素及分布情况;“大宗族—小家庭”的宗族结构特点及其影响;以个案展现宗族社会生活实态;宗族与徽商经营活动的互动关系;宗族与科举的互动关系;宗族与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的关系;宗族的迁徙与定居活动;宗族与社会变迁等。唐力行先生正是以宗族为抓手,深入到徽州社会经济史的方方面面。与作者以前著作相比,该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增加了对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徽州宗族状况的研究,从而将徽州宗族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全过程都呈现出来。该书研究徽州宗族,并不限于宗族制度本身,而是将之作为徽州人的生存状态加以考察。这一旨趣体现在:一、将徽州宗族研究置于徽州经济、社会、文化各要素的关联中考察,并且历史和辩证地看待宗族在徽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是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如徽商与宗族的关系,一方面宗族为徽商提供了强力支持;但另一方面向宗族注入资金影响了徽商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使宗族成为徽商近代化的沉重包袱。历史重在回到现场、还原真相,故该书特辟一章记录徽州人宗族生活的实态,通过方志、族谱、宗族活动的会议记录、田野调查等重构了抗战前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的宗族结构、宗族生活等。这对于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运作,以及宗族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尤有裨益。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是唐力行先生此前十多年徽学研究的论文结集,分徽州宗族、徽州商人、徽州文化、徽州社会、徽州人物五部分。“徽州宗族”部分主要考察了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的关系、徽州家庭宗族结构的形成及对徽州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并以方氏为个案研究了徽州宗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徽州商人”部分研究了徽商的形成、特色、群体心理,以及徽商中的海商、茶商、木商等不同商人群体。“徽州文化”部分讨论了徽商文化的内涵、特点、历史地位,强调新安理学与商人文化的关系。将徽商文化的特征归结为:科学性与实用性、封建性和伦理性、通俗性、

广泛性等。“徽州社会”着重分析徽州区域研究的基础工程,即徽州区域地理与人口,比较了徽州与苏州两地社会发展的差异,研究了商人妇的社会功能以及徽商的历史命运。“徽州人物”部分主要是对胡铁花和胡适父子的研究。该书是唐力行先生此前徽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

《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 至 20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近年唐力行先生对徽州区域研究的思考。是著分析了 16 至 20 世纪徽州乡村自治的内在动力、外在动力和运作方式,并研究了徽州区域内乡村自治系统“内循环”断裂后宗族记忆的重建和外循环断裂后乡村自治的延续,以及内外两个循环系统瓦解后乡村自治的消亡。该书构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一个典型范式,即区域内的要素互动形成的内循环系统与同乡会为主体的区域外循环系统之间的互动对区域乡村社会的影响。这是唐先生积三十多年徽学研究之功的理论沉淀所得。

王学典在其《中国历史学五十年》(2004 年)一文中,将唐力行先生列为当代徽商研究的代表人物。在以傅衣凌为代表的第一代徽学研究者和以王振忠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徽学研究之间,唐力行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徽学研究者颇具承前启后的特点,他们构建了徽学研究体系的基本框架。

因此梳理唐力行先生在徽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特点,对于唐力行先生这一辈学者为创建徽学研究体系所做的贡献也有管中窥豹的意义。唐力行先生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从宗族入手,关注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各要素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宗族与徽商、科举、新安理学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徽学研究的系统论观点。唐力行先生认为战乱中迁徙至徽州的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宗族为了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则为宗族聚居、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则是徽州商帮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

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而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①。徽商、科举、新安理学等三要素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它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等水系则将徽州与江南相连,通过商人、士子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能持续运行。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系统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②

2. 关注“小徽州”与“大徽州”的互动关系。唐力行先生在界定徽州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时认为徽州区域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三个层次互相作用,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核心层次是“小徽州”,中间和外围层次则为“大徽州”。而能够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则是徽商,徽商又分三类型:坐贾、行商、海商,三类型的徽商各司其职,形成庞大的购销、流通网络。这样一来,就把徽州区域研究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内,把单一、静态、直观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③在对徽州乡村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研究中,唐力行先生着力考察“小徽州”的域内循环与“大徽州”的域外循环之间的互动互补及其对徽州乡村自治的影响。他认为:“区域研究绝不能以区域的疆界为限。因为,除了区域内部的互动外,区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也是揭示区域整体特征的重要方面”,^④即区域研究既要守住地域的疆界,又要跨越地域的疆界。

3. 注重当时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唐力行先生对于 20 世纪八

①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②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③ 同上。

④ 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第 17 页。

九十年代学界关注和争论的“资本主义萌芽”、“近世社会转型”、“封建社会长期性”、“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化”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和自己的思考。这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往往回避历史的宏大叙事,执着于琐碎考订、情景再现,流于“玩物丧志”,可做镜鉴。

1994年唐力行先生回到故乡苏州,在苏州大学工作。学术研究的重心也由“小徽州”转向了“大徽州”,关注徽州与苏州,乃至与整个江南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唐力行先生指出,每一个特定区域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关系。这个大区域其实就是小区域的集散效应圈。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

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唐力行先生将苏州与徽州比较,两者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徽州则由于地理闭塞、物产瘠薄,只有用当地物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要之,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两大土产。

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规律,只有在区域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①唐力行先生的苏州与徽州区域比较研究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成果汇于《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一书,是著研究了明清时期苏州的家庭结构、社区管理、保障系统和社会信仰及社会心态,并将之与徽州比较,揭示出徽商的经营活动一方面加速了苏州近代化的转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

型,但另一方面却加固了徽州的宗族制度和古旧状态。该研究无论是在实证方面还是在区域比较理论的尝试方面都颇有创新之处。

2000年初唐力行先生至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继续进行“大徽州”层面的区域史研究,其《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在此期间,唐力行先生发表了《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2000年)、《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2002年)、《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合作)、《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2004年)、《多元与差异: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合作,2005年)等。通过上述研究,唐先生拓展了其在徽学领域的研究视野,进行了区域互动理论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小徽州”的内循环与“大徽州”的外循环互动作用于徽州乡村社会的研究范式。其成果汇于《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

其间,唐力行先生敏锐地把握到国际学术界“新文化史”研究的转向,在整理其父唐耿良先生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应以“新文化史”范式研究江南区域史,即将评弹与江南社会的互动结合起来研究。当唐力行先生的工作地点由苏州调动至上海,他也在关注近代评弹如何由苏州流入上海,其学术亦随人生轨迹转向。唐力行先生指出,评弹诞生和成长于江南的这片文化土壤,近代又由苏州走进大都会上海,成为苏州与上海这两个不同类型城市间的文化纽带。评弹还是上海多元文化中显著的一元,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借助广播,更是成为上海城市的背景音乐。唐力行先生尝试在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中找到社会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融通的方法,提出“从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评弹”的研究视角。我们知道,关于评弹的研究一向在文学和曲艺的领域里进行,而将评弹与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

进行大规模系统研究还属首创。目前唐力行先生已经集结了一支高效、精干的研究团队,唐力行先生因得家学、地利、人和之便,进行该项研究自然得心应手,不久即整理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由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009年)一版、再版。唐力行先生的研究团队还于2010年开始出版“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后面有详细解说,此不赘述。

近十年,唐力行先生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稳步推进。2006年其“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的变迁”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08年又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2011年其“评弹资料整理与研究”被列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项目。2014年以唐力行先生为首席专家的“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得立项,为其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该项目的子课题包括:中国评弹社会史料集成、苏州评弹书目库、一百位评弹人口述历史、评弹社会史研究专题、评弹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该项目研究主要从评弹构成的四要素,即书目、书场、艺人、听众出发确定研究专题,注重在时间、空间维度中四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因该课题的跨学科特点,在研究中强调多学科的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运用。

正如唐力行先生自述:“从徽州、苏州到上海,从社会经济史到社会文化史,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①唐力行先生的人生学术是一体的,他生活工作的轨迹从异乡的皖南,到故乡苏州,再至其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的上海,他学术研究的起点从异乡的徽州开始,研究的脚步随着他的人生步履回归苏州、上海,具体来说回到他在成长期时耳濡目染的评弹与江南核心地区的苏州、上海。然而做学研究终究是唐力行先生的学术底色,人生的故乡与学术的故乡在互动中交相辉映,也激励着唐力行先生对于学术与人生不断的思索与创新。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